

# 檔案與史學： 赫德與李度檔案編纂史

張志雲\*

## 摘要

本文從機構、檔案館和私人收藏檔案的差異，討論史學研究和檔案編纂時遇到的機遇和困境。案例分三階段討論：1930 年代海關圖書館成立後，關員史學家整理總稅務司檔案、1960 年代李度與費正清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貝爾法斯特皇后大學和哈佛大學檔案館整理赫德和李度檔案，以及當代布里斯托大學團隊與李度後人出版李度日記。若檔案由機構收藏時，編纂和研究會快速發展，但是檔案會被機構壟斷。由檔案館收藏時，若檔案被完善編纂，史學研究將快速推動，但是若檔案無人編纂則被湮沒。而由私人收藏有兩種情況：若是本人收藏，因其了解該檔案，檔案編纂進行順利，但是其改寫會傷害檔案價值；若是家族收藏，雖然不會隨意處置檔案，但是常因在乎先人名譽，而增加檔案編纂的困難，但是編纂者仍應遵守承諾，儘量維護其先人名譽以利史學界獲得新檔案。

**關鍵詞：**赫德、李度、費正清、畢可思、檔案編纂

---

\*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一、前言

在從 1854 到 1949 年的 96 年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的歷史中，有四位英籍總稅務司、一位日籍、一位美籍。其中，英籍的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以及美籍的李度（Lester Knox Little, 1892-1981）總稅務司留下大量書信和日記。雖然兩人都是國際知名人士，但是在他們退休後，其重要性都迅速消逝，是因為編纂者對其遺留檔案的整理，他們的歷史意義才被史學家得知。雖然編纂者和史學家對待檔案和研究的立場應該一致，但是不同的檔案收藏者對史料利用的態度，導致在面對史料收藏者時，編纂者必須調整其研究立場和編纂倫理，方能讓檔案公諸於世。本文即探討三代歷史研究者在切換史學家和編纂者的身分時，面對機構、檔案館和私人三種不同的檔案收藏者，應當如何調整研究立場和編纂倫理。

為回答上述問題，本文將編纂赫德與李度檔案分三階段討論：一、1930 年代，海關圖書館成立，一方面推動海關史研究，但同時也讓海關檔案被壟斷在總稅務司署中；二、1960 年代，李度和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11）從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和貝爾法斯特皇后大學檔案館中將赫德檔案移到哈佛大學後，開始編纂工作，同時費正清也將李度檔案收藏在哈佛大學胡頓圖書館（Houghton Library）；三、2010 年代，布里斯托大學團隊整理李度家族收藏的李度日記，同時發掘胡頓圖書館的李度檔案，並了解李度在 1970 年代出版其檔案的顧慮，以及李度後人對出版其日記的期待。80 年來，兩位總稅務司檔案的整理工作是四代中國大陸、臺灣、美國、英國史學家的合作成果，這段國際史學史也是追溯哈佛學派的起源以及近代中國史在四地型成的線索。

## 二、機構收藏

自杜德維（Edward Drew, 1843-1924）和馬士（H. B. Morse, 1855-1934）以降，海關史的發展，是以中國海關外籍關員的研究推動，這就

是所謂的「關員史學家」（CMCS in-house historian），<sup>1</sup>但是他們的研究得益於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造冊處下轄海關圖書館，但是在義和團燒毀圖書館後，他們沒有檔案的支持，海關史研究從而中斷，這也是為何馬士必須要等到退休移居倫敦後，才得以查閱檔案完成著作。而1930年代，海關圖書館重建，立即變成保存海關檔案最完處的機構，其館藏豐富使得1930年代的關員史學家得以大力發展海關史研究，甚至有超越馬士的海關史研究的勢頭，但是關員史學家卻因忌憚學界史學家的競爭，而壟斷海關檔案，使得海關史研究只限於關員史學家，因此中外學界並不了解關員史學家的成果。

### （一）關員史學家

赫德創建的中國海關圖書館於1900年毀於庚子拳亂，總稅務司梅樂和（Frederick Maze, 1871-1959）遂於1931年開始重建海關圖書館。<sup>2</sup>這有力推動班思德（Thomas Banister, 1890-1955）和魏爾特（Stanley Wright, 1873-1953）研究海關史的進程。因為馬士只是以個人之力研究，但是此後是以機構支持班思德和魏爾特研究海關史。梅樂和指示班思德與魏爾特「記錄中國海關在近代中國的商業史、貿易發展中扮演的多元角色。」<sup>3</sup>1931年底，班思德在第五期《海關十年報告：1922-1931》的卷首撰寫了《最近百年中國對外貿易史》一文，鄭友揆讚許為：「敘述自東印度公司取消〔1833年英政府取消其對華貿易壟斷權〕至我國關稅自主後，百年間我國對外貿

<sup>1</sup> 畢可思（Robert Bickers）將杜德維、馬士、班斯德和魏爾特稱為Customs historians and Service historians，參見Robert Bickers, “Purloined Letters: History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Modern Asian Studies*, 40: 3 (July, 2006), pp. 693, 703；而馮翰士（Henk Vynckier）與筆者稱之為CMCS in-house historians，參見Henk Vynckier and Chihyun Chang, “The Life-Writing of Hart, Inspector-General of th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4: 5 (December, 2012), p. 6.

<sup>2</sup> 梅樂和通令第4251號，1931年6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辦公廳編，《中國近代海關總稅務司通令全編》（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13），第20卷，頁627-38。（以下簡稱《通令全編》）

<sup>3</sup> 梅樂和機要通令第71號，1931年1月30日；《通令全編》，第41卷，頁155。

易情形，計長二百頁，尤足珍貴」，<sup>4</sup>然後又於 1932 年出版《中國沿海燈塔志》，畢可思（Robert Bickers, 1964-）稱之為：「迄今唯一最重要關於中國燈塔的研究著作」。<sup>5</sup>

魏爾特是更重要的關員史學家。他從整理赫德檔案和海關文件著手，先在 1935 年完成第三版的《民國以來關稅紀實》，<sup>6</sup>詳細分析從中國實現關稅自主後至 1934 年，總稅務司署緝私科的發展以及走私活動與關稅自主之間的關係。1936 年，魏爾特又完成《中國海關的源起和發展》（*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1843-1911: An Historical Outline*），這本是赫德傳記的草稿，因此並未打算出版。<sup>7</sup>但是其對史學界的首要貢獻就是在 1937-1940 年，魏爾特完成了海關通令和各國外交部檔案的整理、搜集完中國海關出版品、並整理出利用檔案的索引卡片，最後編纂七冊的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總稅務司梅樂和認為：

許多早期的總稅務司通令已經絕版。因為在海關中現在或是未來被負予重任的關員有需求，所以這些檔有必要再度發行。我決定再度發行一套精簡且方便的檔案彙編，包含關鍵通令，其內容涉及海關的起源、發展和活動。為了補充這些通令，並且讓讀者更易於瞭解海關代表的意義，以

<sup>4</sup> 鄭友揆，〈我國海關貿易統計編制方法及其內容之沿革考〉，《社會科學雜誌》5：3（南京，1934.9），頁 264-296。轉引自鄭友揆，《中國的對外貿易與工業發展：1840-1948》（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頁 324。

<sup>5</sup> Robert Bickers, “*Infrastructural Globalisation: Lighting the China Coast, 1860s-1930s*,” *The Historical Journal*, 56:2 (June, 2013), p. 432.

<sup>6</sup> 本書是由華籍幫辦陶樂均翻譯。參見張志雲，〈革命時期的財政秩序：辛亥革命與海關結餘存放權之轉移〉，收入唐啟華等著，《近代中國的中外衝突與肆應》（臺北：政大出版社，2015），頁 153-155。

<sup>7</sup> 1939 年造冊處仍然將其出版，魏爾特聲稱：該書僅在「私人之間流通」，並且只是「一部大部頭著作的初步概略」，並註明，「如果要詳閱中國海關史，請參照《中國關稅沿革史》第二章」。Stanley Wright,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1843-1911: An Historical Outline*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39), p. i.

及過去的成就，相關的檔、信函、備忘錄等都被收錄其中。這些檔來自於外國的外交部，這些檔為本套檔案彙編的末卷。本套彙編自始就由魏爾特挑選，並且他還撰寫了大量註腳和編纂索引。<sup>8</sup>

第一至五冊收錄了1861年至1938年的關鍵通令，與通令相關的中外政府檔案也一併附上。第六冊收錄英國外交部檔案、第七冊是從美、法、葡三國外交部搜集的檔案。但是第七冊有一份常常被忽略的文件，而這正是推動赫德研究的進程：Charles Lucas 寫的赫德傳。<sup>9</sup>魏爾特看到了Lucas赫德傳的不足但是也意識到史學界已開始注意赫德的重要性，於是決定開始撰寫他自己的學術專著，第一本就是《中國關稅沿革史，1843-1938》（*China's Struggles for Tariff Autonomy, 1843-1938*），而其首要著作則在1950年完成，這就是《赫德與中國海關》。雖然魏爾特宣稱這並非「試圖呈現一般意義上的傳記，頂多只是稍微觸碰到赫德的私人與家庭事務」。<sup>10</sup>這可能是因為魏爾特「太過於接近海關史這齣劇碼中的後期演員們，而他們正是他著作的資助者和讀者，從而警戒他別太靠近〔某些敏感的議題〕」。<sup>11</sup>至今《赫德與中國海關》仍是最接近赫德傳記著作。

## （二）海關檔案的壟斷

雖然關員史學家的史料編纂和史學研究的成果非常豐碩，但是關員卻不想與史學家分享海關檔案。梅樂和和魏爾特發現，費正清從馬士處得到一部分海關檔案，並且得到蔣廷黻（1895-1965）的幫助，利用《籌辦夷務始末》和海關英文檔案，撰寫中國海關史。但是總稅務司和關員史學家並不希望與史學界分享檔案。

<sup>8</sup> Stanley Wright,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vol. I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37), p. i.

<sup>9</sup> “Obituary: Sir Charles Lucas – Historian of the Empire,” *The Times* (London), 8 May 1931, p. 11.

<sup>10</sup> Stanley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Belfast: Mullan & Son, 1950), p. xiii.

<sup>11</sup> Robert Bickers, “Purloined Letters: History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p. 3.

二十世紀初的史學家認為赫德的重要性還不及馬士，因為後者撰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是歐美史學界瞭解近代中國史的巨著。這部書特別引起研究英日同盟史學家的關注，查理斯·韋伯斯特（Charles Webster, 1886-1961）對此書尤為推崇。1929年，費正清進入牛津大學，韋伯斯特讓費正清（1907-1991）讀的第一本專著即為此書，此時費正清才知道馬士是美國人，也是哈佛大學畢業生，甚至就住在離倫敦不遠處的 Surrey。<sup>12</sup>費正清去拜見馬士時，就發現世人已忘記赫德：

如果馬士博士不是歷史學家，那麼他就會像赫德爵士一樣在人們的記憶中凋零，因為赫德爵士在1907年〔原文有誤，赫德於1908年回英國〕回家，經歷了55年締造中國海關的生涯後，變成了一個在自己太太的畫室裡，不被需要的有趣老頭。<sup>13</sup>

爾後，費正清聽從韋伯斯特的建議，前往清華大學拜訪蔣廷黻，同時拜訪梅樂和、魏爾特和李度。不過費正清對魏爾特似乎是個威脅。費正清回憶他們初次會面時，魏爾特表現得「機警而謹慎，唯恐我跟他在論述海關史的專著上爭強鬥勝。當他聽到我要到北京去開始學習漢語時，看得出他消除了疑慮。」<sup>14</sup>事實上，根據魏爾特致郝樂（Basil Edward Foster-Hall, 1894-1975）的信件，可知當時魏爾特已經退休，但對費正清深具戒心：

極機密。我敢說費正清正在追尋赫德與金登幹之間的往來

<sup>12</sup> 費正清與馬士，參見詹慶華，〈中國海關洋員與哈佛的漢學研究——以馬士與費正清為中心〉，《上海海關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現改名為《海關與經貿易研究》），2006：4（上海，2006），頁67-72。費正清與清華大學蔣廷黻的合作，參見張志雲、侯彥伯、范毅軍，〈瞭解中西交往的關鍵史料——《籌辦夷務始末》的編纂與流布〉，《古今論衡》，24（臺北，2013.6），頁83-114。

<sup>13</sup> John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p. 22.

<sup>14</sup> John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p. 37.

信件的下落。費正清是一位在牛津大學進行博士研究的哈佛學人，並熟識馬士，正在從事以早期海關史為主題的研究。馬士對費正清十分慷慨，並借與他所有個人信件。儘管不斷有來自各方的要求，但費正清還是拒絕返還這些信件，他認為這是馬士贈予他的禮物。關於這件事，馬士的太太曾向梅樂和寫了封措詞激烈的抱怨信件，為此我們停止提供給費正清更多的內部資料。費正清不久前以其關於早期中國海關史的論文取得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而且我也說過，他依然持續從事此一主題的研究。<sup>15</sup>

由於魏爾特看管著赫德相關的檔案資料，使得費正清無從研究1854年後之海關總稅務司署，費正清只好調整博士論文的研究範疇，轉向1842-1854年間，總稅務司署尚未成立前的歷史。費正清於1930年完成B.Litt.論文：〈英國政策與中國海關的起源（1850-1854）〉（“British Policy in Relation to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1850-1854”）。<sup>16</sup>該論文之後出版為《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一書。博士畢業後，費正清開始鑽研另一套檔案彙編，這就是蔣廷黻指導他研究的《籌辦夷務始末》。費正清發表的第一篇期刊論文〈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前的鴉片貿易合法化研究〉就是利用《籌辦夷務始末》寫成。<sup>17</sup>

換言之，費正清的研究不是從馬士贈與的檔案或是赫德檔案入手，而是從《籌辦夷務始末》以及英國外交部史料入手。關員史學家把持史料，敝帚自珍，這是當時費正清在1930年代遇到的

<sup>15</sup> Copyright of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MS 16/C/5, Wright to Foster-Hall, 23 November 1943.

<sup>16</sup> Paul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8), p. 18.

<sup>17</sup> John Fairbank,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Opium Trade before the Treaties of 1858,”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7:2 (July, 1933), pp. 215-263.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ed.,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Press, 2011), vol. 20, p. 238.

問題，但是三十年後，他發現海關洋員面對海關檔案時的另一種意圖，這是1960年代檔案編纂者遇到的困境。

### 三、檔案館收藏

1960年代史學界重啟整理赫德檔案以及李度檔案之出現，其關鍵人物就是李度而不是費正清。要等到1968年李度把赫德信件展現給費正清後，費正清才重啟赫德檔案的整理工作。此事為何要等到1968年才發生？而且為何會於遠在美國的哈佛大學檔案館中整理？此時赫德檔案分別收藏在倫敦大學亞洲學院和貝爾法斯特皇后大學的檔案館，當年總稅務司署壟斷檔案的問題迎刃而解，但是兩個新問題導致延誤：一、李度的身分變得敏感；二、梅樂和控制檔案的意圖。前者讓李度無暇整理赫德檔案，同時也因為他的敏感身分讓他不敢在1970年公開其檔案；而後者大幅加劇整理赫德檔案的困難度，並且讓赫德檔案離開英國檔案館而被美國的費正清整理。但是經過費正清團隊整理出的赫德和李度檔案呈現了兩種不同的結果：前者被善加編纂，出版成書，而後深遠影響中外學界；但是後者卻無人聞問，消失在學界視野，直到2017年才又被學界發現。

#### （一）李度的敏感身分

李度檔案為什麼會變得敏感？因為李度自總稅務司退休後，仍活躍於世界各地。不僅自1950年至1954年，李度受財政部長嚴家淦（1905-1993）聘請，任有給職財政部顧問，<sup>18</sup>並且還有另其他身分，美國經濟合作總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sup>18</sup> “Little to Yen (23 May 1954),” in Lester K. Little,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His Commission as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臺北：關務署圖書館藏), vol. IV, p. 63; “Yen to Little (29 May 1954),” in Little,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His Commission as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vol. IV, p. 44; “Little to Lo and Fang (8 June 1954),” in Little,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His Commission as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vol. IV, p. 69.

邀請李度擔任海關顧問，<sup>19</sup>即前往日本和菲律賓協助重建海關。<sup>20</sup>之後又擔任新聞署的人事部長（Director of Personnel）。新聞署是艾森豪的冷戰政策，是美國政府將其在二戰中的心理戰部門改組成冷戰中意識型態輸出部門，同時也是統合戰時情報局和國際情報管理局，協助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向全球「說好美國故事」。<sup>21</sup>李度一直厭惡杜魯門（Harry Truman, 1884-1972），而尊敬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sup>22</sup>艾森豪任命的首任新聞署長 Theodore C. Streibert (1899-1986) 邀請李度任人事部長時，李度欣然同意。新聞署長一職是由美國總統直接任命，參議院同意，僅聽命于美國總統。<sup>23</sup>而且做為向全球建立分支宣傳機構，「美國新聞署確實可以變成中央情報局的掩護」。<sup>24</sup>Streibert 厭惡中央情報局官員，所以他想尋找超然於國內政治且又有管理跨國人才的專業經理人，李度就成為合適人選。雖然 Streibert 和李度努力地與中央情報局保持距離，但是李度的工作是向經濟合作總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gency）、戰時情報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sup>25</sup>和國際情報管理局（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up>19</sup> “Howard Ross to Little (22 December 1950),” in Little,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His Commission as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vol. II, p. 92.

<sup>20</sup> 李度與日本海關重建，參見 Chihyun Chang, “Empires and Continuity: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in East Asia, 1950-1955,” in *Overcoming Empire in Post-Imperial East Asia*, eds. Barak Kushner and Sherzod Muminov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Publishing, 2021), pp. 165-182.

<sup>21</sup>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

<sup>22</sup> Chihyun Chang, ed., *The Chinese Journals of L. K. Little, 1943-54: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War and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7), vol. III, p. 161.

<sup>23</sup> “Creation of Positio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1997-2001.state.gov/about\\_state/history/officers/usia.html](https://1997-2001.state.gov/about_state/history/officers/usia.html)> (2025/12/31)。

<sup>24</sup>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p. 98.

<sup>25</sup> 戰時情報局現況，參見“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RG 208),” National Archives <<https://www.archives.gov/research/foreign-policy/related-records/rg-208>> (2025/12/31)，亦可參見賈欽涵，〈戰時情報局與美國對華政策（1942-1945）〉，《抗日戰爭研究》2015：2（北京，2015），頁93-107。

Administration) 招募員工，所以李度的身分和檔案也變得敏感。

1956 年艾森豪連任美國總統後，Streibert 辭去新聞署長的職務，<sup>26</sup>李度的工作更為重要。但是此時的工作變得更為艱困，因為蘇聯於 1957 年 10 月發射斯普特尼克一號，美國決定在航太科技急起直追，但是一時三刻無法超越蘇聯，所以必須由新聞署加強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宣傳，安撫其緊張情緒。所以於 1957 年 2 月 25 日，艾森豪決定將新聞署長列為作戰調整委員會（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成員，<sup>27</sup>然後又把作戰調整委員會納入國家安全會議之下。至此，新聞署正式成為美國國安機構一環。這一年，新聞署估計全球收聽美國之音的聽眾高達 3 億 5 千萬人。<sup>28</sup>李度就在 George Allen（生卒年不詳）擔任署長期間負責招募、訓練和評估全球的新聞署員工，更於 1958 年 2 月，李度拜訪全球的新聞署員工，「會見了 140 名美籍員工及其家庭，和五六百名外國員工」。<sup>29</sup>李度確保新聞署的美、外籍員工不受美國國內政治的影響，而他在中國海關的華籍關員則變成新聞署員工的理想對象，因為他們英文流利，長期保持政治中立，而且非常熟悉歐美的文官體制。李度做為人事部長，曾幫助很多前華籍關員進入新聞署工作，例如：來臺後第一任總稅務司方度（生卒年不詳）被監察院彈劾後退休，<sup>30</sup>即進入新聞署，並舉家搬去美國。<sup>31</sup>

<sup>26</sup> “Theodore Streibert, First Director of USIA,”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22 January 1987.

<sup>27</sup> 作戰調整委員會，參見“Executive Order 10483—Establishing th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executive-order-10483-establishing-the-operations-coordinating-board>> (2025/12/31)。

<sup>28</sup>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p. 134.

<sup>29</sup> “Little to USIA Director George Allen (21 February 1958),” in Little,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His Commission as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vol. V, p. 54.

<sup>30</sup> 〈海關總稅務司方度等涉嫌違法瀆職，侵佔國家外匯，監院彈劾移送法辦〉，《聯合報》（臺北），1957 年 2 月 16 日，1957 年 2 月 16 日，2 版。

<sup>31</sup> “John Bottorff to Fang Du (15 August 1960),” in Little,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His Commission as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vol. V, p. 112.

1960年4月，李度提出退休。<sup>32</sup>Allen寫了一封長信「勉為其難」地接受李度的退休，並盛讚：「你贏得不僅新聞署高層的信心和尊敬，國務院也同樣的尊重你。你成功地處理新聞署中最困難的工作。」但是Allen希望李度「到東亞做實地調查，並對新進員工訓練的成果提供第一手的報告，同時也要瞭解新聞署的東亞員工對其生涯發展規劃，以及他們的士氣情況。」他還希望李度可以「考慮繼續擔任新聞署的兼任顧問，協助管理新聞員工的訓練。」<sup>33</sup>李度接受了Allen邀請，但是他兼任工作不到一年就結束，這是因為1960年11月，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 1913-1994）以微小差距輸給甘迺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 1917-1963）後，Allen自新聞署退休，<sup>34</sup>然後新聞署長Edward Murrow（1908-1965）、副署長Donald M. Wilson（生卒年不詳）和另一位副署長Thomas C. Sorensen（1926-1997）都是甘迺迪的親信。<sup>35</sup>李度極度不滿，向新任署長道：「新聞署一直都享有免於政治影響其選拔、晉升和調任其員工的聲譽。因此當我今天得知Thomas C. Sorensen被任命為Deputy Director（Policy and Plans）後感到沮喪和憂慮」，「就只是因為他是某個白宮有影響力政客的兄弟」。李度最後總結道：「我沒辦法想到一個更糟的方式打擊他們的士氣，並且埋下嘲諷和憂慮的種子。」<sup>36</sup>面對這封措詞嚴厲的信，Murrow僅否認白宮與此任命有關，並告訴李度「我只能希望這些

<sup>32</sup> "Little to USIA Director George Allen (13 April 1960)," in Little,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His Commission as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vol. V, p. 97.

<sup>33</sup> "Allen to Little (5 May 1960)," in Little,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His Commission as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vol. V, p. 105.

<sup>34</sup> Felix Belair Jr., "Allen Quits as Head of Information Unit,"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12 November 1960.

<sup>35</sup> Thomas Sorensen是甘迺迪的政治顧問也是講稿寫手Ted Sorensen的弟弟。參見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p. 193.

<sup>36</sup> "Little to Edward Murrow (23 February 1961)," in Little,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His Commission as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vol. VI, pp. 44-45.

嘲諷和憂慮的種子不要太多，而且不要被流傳。」<sup>37</sup>這封具警告意味的回信讓李度與新聞署的關係決裂，不再擔任兼職工作。

在艾森豪執政時期，新聞署已經是史無前例的強大：在 85 個國家有 202 個分支機構，雇傭 3,771 名美國員工和 6,881 外國員工，新聞署長參加國家安全會議和內閣會議，並且每三周在白宮向美國總統彙報業務。<sup>38</sup>如果共和黨的尼克森當選，Allen 不會退休，李度也將繼續其兼任工作，即使兼任也會非常繁重。但是甘迺迪當選後，民主黨的長期執政讓李度不願再為政府工作。

嚴家淦得知李度即將自新聞署人事部長卸任後，寫信給李度：「我希望我們的海關依然會是你長期的『執著』，我們還可以繼續獲得你寶貴的建議。」<sup>39</sup>李度確實是閒不下來的人，他和前三藩市市長，同時也是航運業鉅子的 Roger Lapham (1883-1966) 說到他的退休後的心情：「我還沒有決定我會住在哪裡或我將要做什么，我工作過四十五年，我擔心我會受不了無所事事。」<sup>40</sup>但是四年後，他就發現了讓他長期「執著」的工作：整理赫德檔案。

## （二）梅樂和的隱藏目的

李度於 1960 年底自新聞署退休是因為甘迺迪當選。但是為何這是他開始整理赫德檔案的最好時間？因為梅樂和剛好於 1959 年過世，他生前就把檔案捐贈給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檔案館。<sup>41</sup>此時，李度因為新聞署的工作，未曾注意《梅樂和文件》已經公開，而他注意到亞非學院藏有的海關檔案是因為末任倫敦辦公室稅務司

<sup>37</sup> “Murrow to Little (24 February 1961),” in Little,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His Commission as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vol. VI, p. 46.

<sup>38</sup>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pp. 187-188.

<sup>39</sup> “C. K. Yen to Little (1 June 1960),” in Little,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His Commission as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vol. VI, p. 26.

<sup>40</sup> “Little to Reger Lapham (25 September 1961),” in Little,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His Commission as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vol. VI, p. 131.

<sup>41</sup> 亞非學院的《梅樂和文件》，參見“Frederick Maze,” Special Collections, SOAS Library <<https://blogs.soas.ac.uk/archives/2020/11/05/frederick-maze/>> (2025/12/31) 和 <[https://archives.soas.ac.uk/records/PP\\_MS\\_2](https://archives.soas.ac.uk/records/PP_MS_2)> (2025/12/31)。

郝樂 1965 年提醒李度，當年赫德給首任倫敦辦公室稅務司（Non-Resident Secretary）金登幹（James Campbell, 1833-1907）的回信，還收藏於倫敦辦公室，再不處理的話，就要轉移至英國的公眾記錄處（Public Record Office，現在的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up>42</sup>但是此時，亞非學院已藏有大量梅樂和捐贈的檔案，所以李度建議將這批赫金信件由亞非學院收藏。<sup>43</sup>李度此時已經退休，又對赫德信件很感興趣，就開始研究亞非學院的海關檔案，於是李度終於了解梅樂和控制海關史料的動機。

梅樂和控制史料的意圖究竟是什麼？僅閱讀亞非學院檔案無法了解全貌，甚至有可能被迷惑。例如孔如軻（Nicolas Clifford）即認為梅樂和是個相當正面的角色，<sup>44</sup>而馬汀·艾特金斯（Martyn Atkins）則認為：

史料中呈現的梅樂和的故事是如此美好。初讀之下，會感受到梅樂和一直在英國的官方與非官方之間堅強地鬥爭，為了信譽堅持底線，為了正義抗拒詆毀。然而史料呈現的這則故事必須謹慎處理。這批史料的排列條理清晰，議題相接。不禁讓人懷疑這些卷宗是否為了自我辯護。在這批史料中，梅樂和到處寫滿了難以辨認又尖酸刻薄的旁注，和無所不在的花押簽字。儘管梅樂和呈現的案件中的各個面向或許為真，但是必須非常謹慎地注意這批史料想要引導的研究走向。<sup>45</sup>

艾特金斯的猜測被畢可思證實。畢可思先在亞非學院博士期間，在檔案館大量閱讀《梅樂和文件》，然後又與方德萬（Hans

<sup>42</sup> The full correspondence is enclosed with “L. K. Little to Max Hall (28 July 1968), Hart Letters, public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emos, etc. folder, Box 4, HUGFP 12.28.

<sup>43</sup> See the file “Letters of Sir Robert Hart, Inspector-General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6,” 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RO): 57/974.

<sup>44</sup> Nicolas Clifford, “Sir Frederick Maze and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937-1941,”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7: 1 (March, 1965), pp. 18-34.

<sup>45</sup> Martyn Atkins, *Informal Empire in Crisis: British Diplomacy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Succession, 1927-1929* (Ithaca, NY: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5), p. ix.

van de Ven) 合作整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海關時,<sup>46</sup>比對亞非學院和二檔館的梅樂和檔案，發現梅樂和控制海關檔案的目的。畢可思認為「梅樂和十分在意歷史評價」，並且藉由「他捐給亞非學院的檔案呈現出〔自己營造〕的形象」。<sup>47</sup>畢可思鮮活地描寫了梅樂和的手段：

事實上，因為梅樂和想要利用赫金信件達到他控制和傳播海關史研究的目的，他用以下三種手段：一、替他進行政治宣傳，強化他對海關的控制（當他不是英國駐華公使的屬意人選時）；二、控制海關史研究；三、控制海關史料。而“盜竊信件”標注了梅樂和的巔峰，也見證了他在生涯和職涯的落幕。<sup>48</sup>

李度發現梅樂和的意圖後，李度不想讓海關檔案埋藏於亞非學院檔案館，所以他以三年時間，與郝樂一起把赫德書信整理成二十冊打字稿，<sup>49</sup>李度想把赫德檔案交給值得信賴的史學家，他們想起在三十年前在中國認識的費正清，並問他是否有興趣。<sup>50</sup>在此前費正清已不研究海關史，而轉向中外關係史，因此撰寫《美國與中國》和《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同時在哈佛大學訓練歐美學生閱讀《籌辦夷務始末》，並資助臺灣、日本學生，並且將

<sup>46</sup> 方德萬與畢可思合作整理二檔館海關史料，參見張志雲，〈方德萬與中國海關史研究〉，《澎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2572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25720)〉（2025/10/18）。艾倫·麥克法蘭採訪，黃凱悅翻譯，張志雲校註，〈口述 | 方德萬：歷史、家族與漢學之路〉，《澎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924461](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924461)〉（2025/10/18）。張志雲採訪校註，高晨旭翻譯，〈畢可思談中國海關史與英國的中國研究〉，《澎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89273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892730)〉（2025/10/18）。

<sup>47</sup> Robert Bickers, “Purloined letters: History and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p. 10.

<sup>48</sup> Robert Bickers, “Purloined Letters: History and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p. 8.

<sup>49</sup> Katherine Bruner 對費正清的回憶，參見 P. Cohen & M. Goldman eds., *Fairbank Remember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28-229.

<sup>50</sup> Robert Bickers, “Purloined Letters: History and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p. 29.

中、日文檔案翻譯成英文。<sup>51</sup>是李度讓費正清再開始研究海關史。

1968年，李度把赫德書信的打字稿、他和梅樂和以及郝樂的信件借給費正清閱讀。<sup>52</sup>費正清赫然發現李度口中的「被盜竊的信件」（Purloined Letters）竟然是赫德給金登幹的回信。<sup>53</sup>費正清回信道：「這些史料影響了歷史進程」，「沒有記載的偉人和偉業極易逝去且遺忘，而那些被翔實記載的事件，例如英國的外交政策，就會得到高度關注，我覺得我們欠了赫德爵士，所以我們必須大膽地進行史料整理。」<sup>54</sup>在整理赫金信件時，費正清有李度和郝樂的幫助，他們熟悉赫德筆跡，儘管如此，他們耗費八年才完成編纂工作。<sup>55</sup>最後在1975年出版兩冊《總稅務司在北京》（*The I.G. in Peking*），李度受邀撰寫序言。<sup>56</sup>此時在1920年代之後就自史學家眼中消失的《赫德日記》竟然又浮出檯面。原來赫德曾孫於1970年過世，由於身後無嗣，將77冊的《赫德日記》捐給貝爾法斯特皇后大學。1953年魏爾特過世後，也將檔案捐給貝爾法斯特皇后大學，所以該校藏有大量的赫德及魏爾特的檔案。

但是李度與安格聯（Francis Arthur Aglen, 1869-1932）有著同樣的顧

<sup>51</sup> 關於費正清協助日本學生建立東洋學研究基礎，參見John Fairbank, Masataka Banno and Sumiko Yamamoto, *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Historical and Social-Science Research o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以及平野健一郎的回憶，參見川島真，〈アジア政経学会設立70周年記念：歴代理事長インタビュー・第1回 平野健一郎〉，《アジア研究》，69：2（東京，2023.4），頁27-28。

<sup>52</sup> “J. K. Fairbank to L. K. Little (7 October 1968),” Hart Letters, L. K. Little correspondence 1968-69 folder, Box 4, HUGFP 12.28.

<sup>53</sup> Robert Bickers, “Purloined letters: History and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pp. 7-8.

<sup>54</sup> “J. K. Fairbank to L. K. Little (19 June 1968),” Hart Letters, LKL correspondence 1968-69 folder, Box 4, HUGFP 12.28.

<sup>55</sup> Robert Bickers, “Purloined Letters: History and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p. 29.

<sup>56</sup> Lester K. Little, “Introduction”, in *The I.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 vol. 1, ed. John Fairbank, Katherine Bruner, Elizabeth Matheson, and James Campbel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5-34.

慮，因為這是赫德的個人檔案，不願赫德日記被全面公開。他們瞭解赫德晚年時期與一些女性過從甚密，<sup>57</sup>或是任人唯親的耳語。<sup>58</sup>因此，當郝樂告訴李度「《赫德日記》依然存在，而且將要被捐贈給皇后大學時」，<sup>59</sup>李度立即敦促郝樂與律師協商，發表聲明敦促受贈者應遵守赫德於 1902 年對其遺物所立下的遺願。該聲明中稱其日記「既不能被出版，亦不能借給任何作家」。<sup>60</sup>然而，當日記被正式捐贈給皇后大學後，雖然不得李度等人做主了，費正清仍適時向李度解釋：

《赫德日記》無論是對你或對我個人而言，都不僅是一種收藏文物的嗜好，而是在公正地保存記錄與捍衛好幾代在華外國人所主導的偉大成就，這件事上有其重要性。假使《赫德日記》被證明是如我們所期待的那樣有趣的話，那麼只有少數被證明有資格的學者方能以《赫德日記》為研究的主要史料。這不僅是保留紀念赫德的最好方式，而且也是使得近代中國史評論保持平衡與客觀的最佳選擇。<sup>61</sup>

1974 年，費正清再派學生前往貝爾法斯特嘗試整理赫德日記，但是赫德日記的工作量遠比赫金信件來得大，其原因有二：一、發現赫德日記時，退休外籍關員已年老力衰，無力再投入心力；二、赫德日記的筆跡與其信件相比，更難以辨認，因為赫德回信時尚需考慮金登幹是否容易辨認其筆跡，對自己的日記則不

<sup>57</sup> 赫德與其女性密友，參見 Mary Tiffen, *Friends of Sir Robert Hart: Three Generations of Carrall Women in China* (Crewkerne: Tiffania Books, 2012).

<sup>58</sup> 赫德的任人唯親，參見 Richard Horowitz, “The Ambiguities of an Imperial Institution: Crisis and Transition in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99-1911,”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36: 2 (July, 2008), pp. 275-294.

<sup>59</sup> Robert Bickers, “Purloined Letters: History and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p. 30.

<sup>60</sup> “John K. Fairbank to Foster-Hall (December 14, 1970),” Hart Journals folder 12.28, Box 2, Fairbank Papers (FP), HUP.

<sup>61</sup> “John K. Fairbank to Foster-Hall (December 14, 1970),” Hart Journals folder 12.28, Box 2, Fairbank Papers (FP), HUP.

必有此顧慮。因此赫德日記只有費正清的學生投入編纂工作，<sup>62</sup>最後司馬富（Richard Smith, 1944-）完成第一至八冊赫德日記的校訂工作，並出版《步入中國清廷仕途——赫德日記：1854-1863》（*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 1854-1863*）以及《赫德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赫德日記（1863-1866）》（*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is Journals 1863-1866*）兩書。<sup>63</sup>第二冊於 1991 年出版，而費正清已於同年逝世。

#### 四、私人收藏

鑑於李度曾在中國、日本和菲律賓海關，以及美國新聞署工作，其檔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為什麼李度和費正清並未編纂李度檔案並出版？這是因為李度身分和檔案內容敏感，在臺灣政局緊張之際，仍牽涉許多國民黨人物。這讓李度 1970 年代在刪改其日記時反覆斟酌，最後仍決定不出版。而等到李度過世後，其後人無法整理，直到他們與布里斯托大學團隊聯繫，這才使得李度檔案到了 21 世紀才出現在史學家前。為了解李度檔案的編纂困境，就要從李度本人的顧慮和李度後人的期待討論。

##### （一）李度本人的顧慮

1968 年李度剛把二十冊赫德書信給費正清時，就跟費正清提及其日記的價值，李度說：「這些包括了相當詳細的記載，從 1943 到 50 年（從重慶、上海、廣東、臺灣）……我寫日記為了紀錄人們的來訪和對話，以及宣洩壓力（let off steam）。」<sup>64</sup>費正清同意李度檔案的重要性，所以請李度先將其信件整理成六冊藏放

<sup>62</sup> P. Cohen and M. Goldman, eds., *Fairbank Remember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28-229.

<sup>63</sup> 司馬富與赫德日記，參見張志雲、范毅軍，〈中國近代史觀的分歧——「赫德工程」衍生的討論與爭議〉，《新史學》，24：1（臺北，2013.3），頁209-11。

<sup>64</sup> “Lester Knox Little to John King Fairbank (May 19, 1968),” Hart Letters, LKL Correspondence 1968-69 folder, Box 4, Fairbank Papers, HUG(FP) 12.28,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於胡頓圖書館，並在 1971 年 12 月 16 至 17 日與費正清的學生 Bunker 和 Bruner 完成口述訪談。<sup>65</sup>由於費正清的研究關懷不是國民政府，且就人物重要性和史料豐富度而言，李度無法與赫德相比，所以費正清只將李度檔案保存而未編纂。於是李度在為《總稅務司在北京》寫完序言後，即開始整理其日記，抽出 1943 年至 1954 年的日記準備出版。但是此時李度有兩點顧慮：

一、1970 年代，臺灣的政治氛圍仍然緊張，如果李度日記全文出版，李度的好友孫立人和嚴家淦受到牽連。當時嚴家淦雖然仕途順利假若蔣介石看到嚴家淦當年對李度私下的言論，肯定會對嚴家淦的仕途有嚴重影響。

在李度日記中，收錄了李度與吳國禎（1903-1984）和孫立人（1900-1990）的三次訪談。吳、孫兩人都對當時的中美關係有重大影響。李度與孫立人最後一次的訪談發生於 1952 年 6 月 3 日：

我問孫將軍，如果美國駐華大使獲得美國總統授權，那他可以對蔣介石做什麼？孫將軍回答，蔣介石只有兩個下場：（一）晉升成虛位元首，由內閣掌實權；（二）被趕下臺。（孫將軍把腳踢向我們之間的咖啡桌，然後說翻桌）孫將軍說：如果蔣介石真的被推舉〔成虛位元首〕或是被架空〔neutralized〕，孫將軍就會嘗試透過他的朋友和追隨者控制政府。孫將軍說，外國援助，尤其是金融援助，需要將蔣介石趕走。<sup>66</sup>

孫立人正在和美國人討論若蔣介石變成「虛位元首」或是被「架空」後，他的「朋友和追隨者」採取何種行動。一般人在 1952 說此事已經極為嚴重，孫立人做為軍人，又和外國人討論此事則更為嚴重。雖然此時孫立人已被軟禁，但是訪談一旦公佈

<sup>65</sup> 胡頓圖書館的命名為《哈佛李度檔》（Harvard- L.K. Little Papers）編號為：BMS Am 1999。其訪談為：Conversations, L. K. Little, G. E. Bunker, K. F. Bruner, Cornish, New Hampshire, December 16 and 17, 1971.

<sup>66</sup> Chihyun Chang, ed., *The Chinese Journals of L. K. Little, 1943-54: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War and Revolution*, vol. III, p. 239.

後，就可能追查孫立人口中的「朋友和追隨者」是誰。此外，李度與嚴家淦的對話的也有可能對其仕途造成影響。李度與嚴家淦於1952年6月23日進行訪談：

葉〔公超〕部長和嚴部長說：臺灣總是有“獨立”的可能性。我告訴嚴部長：在1949年最黑暗的日子裡，我會支持獨立（如果美國同意並保護），這總比共產黨解放來的好。但是現在我不想看到獨立，因為這等同于將千百萬中國人丟棄在大陸。<sup>67</sup>

嚴家淦和外交部長葉公超（1904-1981）討論臺灣獨立的可能性以及美國的意見。不要說放在1950年代是極危險的言論，即使是1970年代都可能會被追查。更何況，《李度日記》中有大量批評蔣介石的無能自大和蔣經國的蘇聯式秘密警察統治的言論，而且都明確標注與之對談的中國人名、日期和言論。略加比對，即可得知無數國民黨人在重要會議後向李度通風報信。

二、李度在中國思念其前妻和家人以及單身長居重慶和上海，不免對身邊異性友人有些情感投射。這些私事，就如同赫德或安格聯擔心赫德日記公開後，會傷及其個人形象，所以不論是李度還是其家人都不想透露李度的私事。

這兩重原因，尤其是第一項原因，讓李度反覆斟酌，再三刪減。最後李度將原本43萬字的日記，刪減至33萬7千字。但是之後李度又想要恢復一部分。然而，李度的健康狀況極速惡化，1982年逝世，死前李度都無法完成這項困難的刪補工作。其日記就在他康乃迪克州的家被擱置了二十五年。

1987年臺灣解嚴之後，總稅務司黃清濤準備籌建海關博物館，得知李度「曾捐贈部分史料給哈佛大學」，<sup>68</sup>於是1988年3月

<sup>67</sup> Chihyun Chang, ed., *The Chinese Journals of L. K. Little, 1943-54: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War and Revolution*, vol. III, p. 243.

<sup>68</sup> “黃清濤致沈元榮，1987年12月17日，” in Little,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His Commission as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vol. I, p. 3.

從哈佛大學胡頓圖書館處獲得李度的六冊書信集和口述訪談稿。<sup>69</sup>這六冊書信集搜集了1943年至1964年李度任職中國、日本、菲律賓海關和新聞署時的重要書信。其內容比其日記更加敏感，因為李度日記停止在1954年，1955年底開始於新聞署工作。其於1955-1964年的書信，包括與美國大使馬康衛（Walter McConaughy, 1908-2000）、美國東亞助卿Walter Robertsonh（1893-1970）和John Allison（1905-1978）討論他在臺灣當財政部顧問與嚴家淦合作時的見聞；<sup>70</sup>以及與宋子文（1894-1971）、孔祥熙（1880-1967）、嚴家淦等人討論蔣氏父子與吳國禎、陳誠（1898-1965）、孫立人的恩怨，也有招募前關務署長張運福（生卒年不詳）和前總稅務司方度討論前往美國新聞署任職的書信。不論是其日記還是書信，在1970年代的臺灣還是太過敏感。

## （二）李度後人的期待

當李度過世後，《李度日記》的收藏者就從李度本人變成其家人。李度家人無力編纂《李度日記》，只能期待史學家出面整理。但是當史學家進行整理時，又會儘量保護檔案完整性。這就像費正清向李度解釋為何要出版《赫德日記》：雖然裡面某些內容可能傷害赫德的形象，但是費正清相信，檔案會證明赫德對中國的貢獻。然而李度後人更在乎自己父親或外祖父的名譽。照顧李度家族的心情，尊重對他們的承諾，以獲得他們手上的檔案，然後儘量保存檔案完整性，這就是2010年代布里斯托團隊的困難，而這不是費正清團隊面對檔案館收藏檔案的問題。

《李度日記》的再現就讓海關史的一手檔案從檔案館收藏走向私人收藏的新視野。這也與私人檔案及其衍生的家族歷史

<sup>69</sup> “Huang Ching-hsun to Rodney Dennis (31 March 1988),” in Little,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His Commission as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vol. I, p. 6.

<sup>70</sup> “Little to John Allison (7 February 1953),” in Little,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His Commission as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vol. III, p. 183; “Little to Walter Roberston (12 October 1953),” in Little,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His Commission as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vol. III, p. 184.

(family history) 書寫成為現代史學研究的新趨勢相符合，同時也因為此新趨勢，而產生新的史學書寫立場和檔案編纂倫理的問題。而家族歷史是從畢可思博士研究期間，就利用英國私人收藏檔案研究上海工部局警察局的歷史：《帝國造就了我：一個英國人在舊上海的往事》以及《太古傳：商業帝國200年》我對畢可思的口述訪談：張志雲〈畢可思談中國海關史與英國的中國研究〉網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89273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892730)。在前書中，畢可思從莫里斯·亭克勒（Maurice Tinkler，生卒年不詳）的家人取得其檔案和照片；<sup>71</sup>在後書中，畢可思是被太古洋行的董事會邀請，並且「給予完全的創作自由，以及毫不遲疑的同意將會尊重對公司歷史的詮釋。」<sup>72</sup>

當方德萬和畢可思開始中國海關史項目後，畢可思根據《海關題名錄》完成了22,000名關員資料庫，並建立起China Families的資料庫。<sup>73</sup>2004年方德萬和畢可思的中國海關研究網頁正式上線，所以外籍關員的後代因為看到該網頁和China Families資助庫後聯繫畢可思，並告知家族收藏的史料，其中不乏極為珍貴的史料，例如：未出版的回憶錄、書信、檔案和在中國拍攝的照片。<sup>74</sup>而這正是「中國老照片」網站的創始原因。<sup>75</sup>就在2004年，兩位李度的後人分別和畢可思聯繫分別有兩版不同的《李度日記》。第一位藏有自1938年到1943年3月的五年日記，這是李度在抗戰時期任粵海關稅務司、被拘禁、然後被釋放回美國的日記。畢可思認為這五年的日記「有趣，但不是非常豐富」。<sup>76</sup>第二位手上的日

<sup>71</sup> Robert Bickers, *Empire Made Me: 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 (London: Allen Lane, 2003), p. 343.

<sup>72</sup> Robert Bickers, *China Bound: John Swire & Sons and Its World, 1816-1980* (London: Bloomsbury Business, 2020), p. 431.

<sup>73</sup> “About us,” China Families, <https://www.chinafamilies.net/> (2025/12/31)。

<sup>74</sup> 張志雲，〈歷史圖像與數字人文應用：以“數字中國”數據庫為例〉，收入蔣杰主編，《數字人文與史學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23），頁52-67。

<sup>75</sup> “Panoramic photographs by G. Warren Swire,”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www.hpcbristol.sjtu.edu.cn.](http://www.hpcbristol.sjtu.edu.cn/) (2025/12/31)

<sup>76</sup> 畢可思解釋《李度日記》始末，來自於2023年6月5日和17日與筆者的訪談。

記則是「詳盡紀錄拜訪者和每日行程」。一年半後，畢可思拜訪居住在康乃迪克州格林威治的 Elizabeth Boylan，查閱這份日記，結果畢可思發現「詳盡程度遠超想像。」

呈現在畢可思眼中的不是一份日記初稿，而是李度於 1971 年已整理數年的日記，由李度的女兒 Elizabeth Freeman Shippee（娘家姓李度，即為 Elizabeth Boylan 的母親）保存，但是其家族不知道日記的原稿在何處。經過畢可思的調查，李度日記應該是在 1971 年 7 月 16 日，費正清派其團隊做李度的口述訪談時，與其信件一起被收于哈佛大學胡頓圖書館。<sup>77</sup>李度把他的信件也存放於胡佛研究院和他的母校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最近其日記的原稿才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再度發現，但是其中沒有 1946 年的日記。<sup>78</sup>

2007 年 3 月畢可思拜訪 Shippee 一家，並走入李度曾用的書房，「那裡都是其父在中國的痕跡，包括傢俱、照片、他任總稅務司時書桌上的海關旗」，畢可思完整複製其日記。畢可思「長期目標本是編纂其日記，但是實際執行時，卻非常困難」。但是畢可思並未編纂這份日記，而這項工作最終是在 2010 年 7 月，由畢可思的博士生張志雲接手。

此時，國民黨已於 1987 年宣佈解除戒嚴令，1991 年又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2000 年國民黨失去執政權；加上孫立人和嚴家淦已分別於 1990 年和 1993 年逝世。因此 1970 年代李度的顧慮已不復存在。李度日記與書信中的政治敏感事件有極大史料價值，於是將《李度日記》的原始稿與其打字稿比對後，將打字稿的 33 萬 7 千字，恢復成原有的 43 萬字；但是此時《李度日記》

<sup>77</sup> “Minute of Meeting, July 16, 1971, Mei Shan, Cornish, NH,” Hart Letters – Minutes, Editorial Committee folder, Box 4, Fairbank Papers, HUG(FP) 12.28,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sup>78</sup> 〈[https://hollis.harvard.edu/primo-explore/fulldisplay?docid=01HVD\\_ALMA212059437540003941&context=L&vid=HVD2&lang=en\\_US&search\\_scope=everything&adaptor=Local%20Search%20Engine&tab=everything&query=any,contains,990086209940203941&offset=0](https://hollis.harvard.edu/primo-explore/fulldisplay?docid=01HVD_ALMA212059437540003941&context=L&vid=HVD2&lang=en_US&search_scope=everything&adaptor=Local%20Search%20Engine&tab=everything&query=any,contains,990086209940203941&offset=0)〉（2025/12/31）。

中私生活部分卻是李度後人最關切的問題。雖然畢可思與張志雲和其後人強調這些私事不會傷害李度的歷史評價。但是其後人仍堅持刪去。然而張志雲仍想要儘量保持史料的完整，所以與李度家人逐條比對各項私事後，只將刪去2萬字關於李度私生活的紀錄。

自2013年起，張志雲就開始日記的批註工作，編纂工作的最大難點，也是所有史學家在編纂在華外人日記時的共同難點，就是人名問題。幸而中國人名有六版的 *Who is Who in China* (1919, 1920, 1925, 1931, 1936 and 1950)；美國人名則可仰賴六版的 *Who is Who in America* (1960, 1968, 1973, 1976, 1981 and 1985)；而英國人名則用《泰晤士報》的訃文。而《李度日記》中大量的中外關員，不會出現於上述史料中，則可以利用魏爾特編纂之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以及《海關題名錄》和中外學界對海關史的研究中析出。<sup>79</sup>最終注釋出651名中外歷史人物。當司馬富和方德萬看到此成果後，司馬富回憶起上世紀末，他在費正清和陳詩啟 (1915-2012) 指導下研究海關史料的往事，他指出：「在費正清教授逝世和陳教授的健康惡化後，我開始研究其他的課題。有一段時間，我擔心兩位傑出史學者投下巨大的精力和決心所開創的局面將無以為繼。」而李度日記的出版正是為這個中外共管的奇特機構寫「一部完整歷史的必須品」。<sup>80</sup>而方德萬指出：「仔

<sup>79</sup> 三套史料各有利弊。*Who is Who in China* 記載當時中國人在英語世界中的慣稱，李度日記中也常用這些慣稱。例如張學良 (Chang Hsueh-liang) 條目下就有：張漢卿 (Chang Han-ching) 和 Henry K. Chang。其問題是六版都對同一人編輯傳記並逐年增補，但是最後一版最全面且正確。*Who is Who in America* 則不同，人物必須已經過世才會收錄，但是這就造成搜尋的困難，例如：Jerry Spiker在李度日記中的1945年12月13日出現，但是他在 *Who was Who in America* 中是在第八版 (1982-85) 才出現。魏爾特編的 *Documents Illustrative* 裡對重要關員立傳，但是此書是在梅樂和的監控下，所以對關鍵關員的傳記會有錯誤（例如：安格聯、易紈士、岸本廣吉、丁貴堂）。

<sup>80</sup> Richard Smith, “Foreword,” in *The Chinese Journals of L. K. Little, 1943-54: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War and Revolution*, vol. 1, ed. Chihyun Chang, pp. ix-xiii.

細編纂、全面批註、詳盡引介，〔編纂者〕這段痛苦的努力將幫助史學家研究近代中國和美國如何變成世界霸權，並為中國史和全球史的連接做出巨大貢獻。」<sup>81</sup>

## 五、結論

比較赫德、李度檔案的檔案編纂史後，會發現沒有哈佛團隊二十多年努力，赫德就會是那位「在自己太太的畫室裡，一位不被需要的有趣老頭」，在二十世紀初時，他的名氣還不如《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的作者馬士。李度也一樣，如果沒有布里斯托團隊的努力，他也只是《中國時報》文中的「一位中國真正的朋友」。<sup>82</sup>不論赫德還是李度，其重要性當然超過「不被需要的有趣老頭」和「中國真正的朋友」。藉由編纂者提供史學家研究的素材，而史學家為學界指出歷史人物的重要性。這就是本文回顧八十年來編纂兩位總稅務司檔案的歷史意義。此外檔案是否善加編纂也是關鍵，若善加編纂後就會像赫德檔案被廣為利用，若不加編纂則如李度檔案被學界遺忘。

這八十年編纂史代表三種檔案收藏單位的更替以及收藏單位對史學研究和檔案編纂造成的機遇和挑戰。三階段的挑戰在編纂者日積月累的努力和政治環境逐漸開放將迎刃而解。但是隱藏在各階段的困難之下的是更深層的問題：編纂者和研究者對不同收藏單位的史學倫理問題。

面對機構收藏的檔案，即使編纂者是機構員工，自不應該敝帚自珍或是成為特定人士塑造形象的工具。即便受命如此，也應該在利用完成後公開以及撰寫專著闡明觀點關懷。雖然魏爾特在 1930 年代壟斷海關檔案，但是他於 1950 年出版的《赫德與中國海關》已擺脫梅樂和的控制，而且也為學界指明檔案在何處。面對檔案館藏的檔案，編纂者則應詳加註解，方便學界利用。但是筆

<sup>81</sup> Chihyun Chang, ed., *The Chinese Journals of L. K. Little, 1943-54: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War and Revolution*, vol. I, p. xiv.

<sup>82</sup> 〈我們的老朋友回來了〉，《徵信新聞報》（臺北），1967年2月15日，03版。

者認為，編纂者應該儘量與其檔案人物保持距離，避免做蓋棺論定的史學研究，而努力於讓學界更多元地解讀此人。這或許正是費正清開始赫德工程後，從未寫過一篇關於赫德的研究成果的原因。

若是編纂私人收藏檔案則有不同。赫德檔案藏於亞非學院和貝爾法斯特皇后大學檔案館中；但是李度日記、亭克勒和太古公司的史料則是從其後人獲得。後人不願授人以柄，讓史料編纂者利用其先輩史料，對其大加鞭伐，揚名立萬。如此心情極易瞭解。此中矛盾，就必須以站在後人和史學視角之間平衡。這種平衡難以取捨，其後人極欲維護家族名譽，或是其先輩爭議巨大時，要求編纂者維護其先人名譽時，那要如何取捨？

此時，編纂者應該謹守其與後人的約定，在儘量完整呈現史料的同時，照顧後人的心情。這是私有財產，其後人沒有義務接受編纂者信仰的「檔案為公」概念。雖然編纂者不能因為一己之好惡刪改檔案，但是要尊重檔案擁有者的要求，刪去其不願意示人之處；而在史學研究時，只要各方檔案支持其先人的爭議性是出於同情而瞭解的人性弱點，或是根深蒂固的宗教、政治意識型態等因素，編纂者應該儘量辯護並克制批判，並且往後的學術生命中，維持此立場。雖然此立場顯然不客觀，也有站在其後人立場的嫌疑，比起讓檔案呈現給世人的貢獻而言，個人聲譽的得失，在編纂史的長河中只是滄海一粟。

究竟何時才是編纂如赫德和李度檔案的最佳時刻呢？

高價值檔案與高品質著作高度相關，但是這兩者常常互相傷害。已歷晚清、北洋和國府後，晚清的赫德檔案仍然挑動中外史學家的敏感神經。<sup>83</sup>這就不難想像，在1970年代李度檔案雖然非常重要，對國民黨而言，仍是記憶猶新。其在大陸時期的腐敗不想為世人所知，其於臺灣實行的白色恐怖更是罄竹難書。所以李度

<sup>83</sup> Chen Xiafei and Han Jung-jang, eds., *Archiv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Campbell, 1874–1907*, vol. I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p. ix.

書信要到 1988 年才被拿回臺北總稅務司署檔案館收藏，而李度日記或許真的要到 2017 年方可出版。最後，回到本文欲探討的最深層歷史脈絡：歷史書寫與檔案編纂的關係。其解答就是：等到該檔案不再挑動各方敏感神經後才能編纂，但是時間積累又不能拖到世人完全遺忘其重要性，方才動手整理。在這兩個時間截點之間拿捏，方能讓其研究和檔案價值極大化。但是要如何掌握分寸？這就是歷史研究者在史學家和編纂者做身分切換時的核心考慮。

（責任編輯：梁詠誠 校對：李菡容）

## 引用書目

### 一、文獻史料

- 〈海關總稅務司方度等涉嫌違法瀆職，侵佔國家外匯，監院彈劾移送法辦〉，《聯合報》，臺北，1957年2月16日、1957年2月16日，2版。
- 〈我們的老朋友回來了〉，《徵信新聞報》，臺北，1967年2月15日，03版。
-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辦公廳編，《中國近代海關總稅務司通令全編》，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13。
- 倫敦大學亞洲學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SOAS, PPMS2, Maze papers.
- Belair, Felix Jr. "Allen Quits as Head of Information Unit."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November 12, 1960.
- Chang, Chihyun, ed. *The Chinese Journals of L. K. Little, 1943-54: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War and Revolution*, 3 vols. London: Routledge, 2017.
- Chen, Xiaofei, and Han Rongfang, eds. *Archiv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Campbell, 1874-1907*. 2 vol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 Fairbank, John, Masataka Banno and Sumiko Yamamoto. *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Historical and Social-Science Research o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Fairbank, John, Katherine Bruner and Elizabeth Matheson, eds. *The I.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 2 vo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Fairbank, John.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 Little, Lester K.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His Commission as Inspector 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6 volumes. 臺北：關務署圖書館藏。

“Obituary: Sir Charles Lucas – Historian of the Empire.” *The Times* (London), 8 May 1931, p. 11.

MS 16, Wright's Collection,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Who is Who in America*, eight volumes.

*Who is Who in China*, six volumes.

Wright, Stanley.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37.

## 二、近人專書

鄭友揆，《中國的對外貿易與工業發展：1840-1948》，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

Bickers, Robert. *Empire Made Me: 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 London: Allen Lane, 2003.

Bickers, Robert. *The Scramble for China: 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 1832-1914*. London: Penguin, 2012.

Bickers, Robert. *China Bound: John Swire & Sons and Its World, 1816-1980*. London: Bloomsbury Business, 2020.

Cohen, P. & M. Goldman eds. *Fairbank Remember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ull, Nicholas J.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Evans, Paul.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8.

Fairbank, John, Masataka Banno and Sumiko Yamamoto. *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Historical and Social-Science Research o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Tiffen, Mary. *Friends of Sir Robert Hart: Three Generations of Carrall Women in China*. Crewkerne: Tiffania Books, 2012.

Wright, Stanley.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1843-1911: An Historical Outline*.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39.

Wright, Stanely.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Belfast: Mullan & Son, 1950.

### 三、近人論文

丁怡駿、張志雲，〈海關圖書館與中國政治進程（1863-1951）〉，《蘇州大學學報》，6（2021），頁120-132。

張志雲，〈革命後的財政秩序：辛亥革命與海關結餘存放權之轉移〉，收入唐啟華等著，《近代中國的中外衝突與肆應》，臺北：政大出版社，2014，頁145-186。

張志雲、范毅軍，〈中國近代史觀的分歧——「赫德工程」衍生的討論與爭議〉，《新史學》，24：1，臺北，2013.3，頁205-236。

張志雲、侯彥伯、范毅軍，〈瞭解中西交往的關鍵史料——《籌辦夷務始末》的編纂與流布〉，《古今論衡》，24，臺北，2013.6，頁83-114。

張志雲，〈歷史圖像與數字人文應用：以“數字中國”數據庫為例〉，收入蔣杰主編，《數字人文與史學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23，頁52-67。

賈欽涵，〈戰時情報局與美國對華政策（1942-1945）〉，《抗日戰爭研究》，2015：2，北京，2015，頁93-107。

詹慶華，〈中國海關洋員與哈佛的漢學研究——以馬士與費正清為中心〉，《上海海關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現改名為《海關與經貿易研究》），2006：4，上海，2006，頁67-72。

鄭友揆，〈中國海關貿易統計編制方法及其內容之沿革考〉，《社會科學雜誌》，5：3，南京，1934.9，頁264-296。

川島真，〈アジア政経学会設立70周年記念：歴代理事長インタビュー・第1回 平野健一郎〉，《アジア研究》，69：2，東京，2023.4，頁22-32。

Bickers, Robert. “Purloined Letters: History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Modern Asian Studies*, 40: 3 (July, 2006), pp. 693-703.

- Bickers, Robert.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at War, 1941-45."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36: 2 (July, 2008), pp. 295-311.
- Bickers, Robert. "Infrastructural Globalisation: Lighting the China Coast, 1860s-1930s." *The Historical Journal*, 56: 2 (June, 2013), pp. 431-458.
- Chang, Chihyun. "Empires and Continuity: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in East Asia, 1950-1955." In *Overcoming Empire in Post-Imperial East Asia*, edited by Barak Kushner and Sherzod Muminov, pp. 165-182.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Publishing, 2021.
- Clifford, Nicolas. "Sir Frederick Maze and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937-1941."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7: 1 (March, 1965), pp. 18-34.
- Fairbank, John.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Opium Trade before the Treaties of 1858." *The Chinese Soci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7: 2 (July, 1933), pp. 215-263.
- Horowitz, Richard. "The Ambiguities of an Imperial Institution: Crisis and Transition in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99-1911."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36: 2 (July, 2008), pp. 275-294.
- Vynckier, Henk, and Chihyun Chang. "The Life-Writing of Hart, Inspector-General of th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4: 5 (December, 2012), pp.1-9.

#### 四、網路資料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reation of Position." <[https://1997-2001.state.gov/about\\_state/history/officers/usia.html](https://1997-2001.state.gov/about_state/history/officers/usia.html)>
- National Archives.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RG 208)." National Archives, <<https://www.archives.gov/research/foreign-policy/related-records/rg-208>>
-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Executive Order 10483—Establishing th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executive-order-10483-establishing-the-operations-coordinating-board>>
- 張志雲，〈方德萬與中國海關史研究〉，《澎湃》，〈<https://www.the>

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25720〉（2025/10/18）。

張志雲，〈畢可思談中國海關史與英國的中國研究〉，《澎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89273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892730)〉（2025/12/31）。

China Families. “About us,” China Families, 〈<https://www.chinafamilies.net/>〉（2025/12/31）。

“Panoramic photographs by G. Warren Swire.”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www.hpcbristol.sjtu.edu.cn.](http://www.hpcbristol.sjtu.edu.cn.)〉（2025/12/31）。

## Archives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Eighty Years of Editorial Work on the Robert Hart and John Newell Jordan Materials

Chang, Chih-yun\*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arise in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archival compilation by comparing three different modes of archival preservation: institutional holdings, archival repositories, and private collections. The discussion is structured in three stages. First, in the 1930s, follow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ustoms Reference Library, customs officials who were also historians began arranging and studying the Inspector-General's archives. Second, in the 1960s, the archival collections of Robert Hart and John Newell Jordan were processed through research projects led by John Fairbank and associated scholarly teams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and Harvard University. Finally, in the present day, a research team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stol, working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descendants of John Newell Jordan, has edited and published his diarie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When archives are held by an institution, both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tend to advance rapidly, but the archives may become effectively monopolized by that institution. When archives are held in public archival repositories, if they have been properly compiled, historical research can progress rapidly; however, if no one undertakes their compilation, the materials can easily fall into neglect. Private collections present two possible situations: if the materials are held by the individual to whom they belonged, compilation can proceed smoothly because that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dividual is familiar with the documents, but their personal revisions or interpretive interventions may compromise their historical value. If the materials are held by the family, they are less likely to be casually disposed of, but concerns over protecting the ancestor's reputation can complicate the work of compilation. Even so, compilers should honor their commitments and make every effort to facilitate the release of new archival materials to the scholarly community.

**Keywords:** Robert Hart, Lester Little, John Fairbank, Robert Bicker, Historiography

